七日談（北京篇）

潮起灣區，萬方同席

——從深圳APEC看人工智能與文明互鑒

劉 璟

一位詠春傳承人與機器人同台演練拳法，這樣的畫面，出現在深圳APEC配套文化活動中。人的身法與機器的動作相遇，古老的功夫便有了一種出人意料的呈現。看過這一幕，人們或許會繼續追問：當機器人能夠參與文化表達，文明之間又將如何相識？

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，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舉行，以「建設亞太共同體，促進共同繁榮」為主題。會場內，各經濟體共商合作；會場外，機器人、智能眼鏡和傳統技藝進入來賓的視野。一座城市如何迎接世界，也在這些具體的相遇中，顯露出它對發展與未來的理解。

八方賓朋匯聚的景象，使我想起清宮的《萬國來朝圖》。畫中的宮殿依次展開，來使置身於宏大的禮儀空間，呈現着當時王朝對天下秩序的想像。這樣的圖像有其歷史立場，也保存了古人看待遠方的方式。把它放在今天重新審視，最有意味之處，恰在於世界相逢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。

故宮還藏有一件銅鍍金寫字人鐘。鐘上的人偶身着西洋服裝，手執毛筆，能夠寫出「八方向化，九土來王」八個漢字。筆畫的運行由機械部件預先安排，字跡卻呈現出令人驚異的工整。歐洲的製鐘技藝、中國的書寫工具與宮廷的政治語言，就這樣聚合在一件器物上。中西文明的接觸，曾經如此具體地落在一隻機械的手中。

圖畫與鐘錶背後，都有跨越地域的來往，也帶着那個時代的觀念邊界。「萬國來朝」所包含的熱鬧與盛大，今日讀來仍有感染力；而理解今天的國際交往，則需要把目光放到平等交流、相互尊重之上。深圳的相聚，可以借「萬方同席」來寄意：各經濟體帶着不同的發展經驗與現實關切，坐下來商量共同的未來。

從清宮機械人到灣區機器人，兩種技術景觀也映照着中國與世界交往的變化。曾經，遠道而來的精巧器物進入宮廷收藏；今天，中國企業的創新成果在國際交流中被觀看、被體驗。深圳將研發、製造與城市應用緊密連接，也使世界認識中國的目光，更多地投向正在發生的創造。開放帶來的知識、人才與市場，又持續參與着這座城市的成長。

人工智能為這樣的往來打開了新空間。過去，一件器物、一幅圖像可以遠涉重洋，傳播的速度與範圍卻受到交通和媒介的限制。今天，文化內容借助數字網絡抵達更多地方，智能工具又為講述、翻譯和互動提供新的可能。一個原本陌生的故事，有機會從熒幕上的相遇開始，慢慢進入另一個人的理解。

機會也伴隨着更細緻的工作。機器人演練詠春，首先喚起的是觀看的興趣。拳法為何講究分寸，習武怎樣聯繫人的修養，師承與地方生活又在其中留下了什麼？這些問題，需要傳承人繼續講述。機器人的出現使話題有了新入口，文化的深意則在人的解釋、示範和交往中逐漸展開。

中西文明互鑒同樣需要這樣的耐心。借助智能工具介紹一幅中國畫，若只把山水、亭台、古裝人物轉成幾種容易識別的符號，觀眾得到的認識便十分有限。畫中的空間如何經營，題詩怎樣改變意境，一種筆法為何值得珍惜，都需要結合具體作品說明。工具可以幫助擴大接觸面，研究者仍須對細節與判斷負責。

尤其在文化內容的生成中，歷史的差異應當得到尊重。倘若唐宋衣冠被混成籠統的「古風」，不同地域的藝術被化約為相似的色彩與紋樣，即使畫面華美，也難以增進真正的認識。人工智能參與文化傳播，應讓更多文化保留自己的面貌，並使作品的出處、創作者的勞動獲得應有的重視。技術的便利，需要與知識的準確相互支持。

由此回看APEC的深圳之約，人工智能與文明互鑒，實際上共同指向一個問題：人們怎樣在差異之中合作。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需要交流，文化的理解需要交流，和平的維繫同樣需要交流。各方能夠持續對話，才有條件共同處理發展中的難題。國際會議所凝聚的合作意願，也應當延伸到科研、教育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。

和平的價值，也正在這些聯繫中變得可感。一項跨境研究需要穩定的合作預期，一門傳統技藝的海外傳授需要面對面的信任。持續的大國對話與區域協商，能夠為這樣的長期創造增加確定性。灣區的高質量發展，也需要在自身的創新之外，為外部世界提供合作的空間，使人們願意帶着知識而來，也能夠帶着收穫而歸。

習近平主席在這次會議上強調促進人文交流和民眾相知相親，並將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作為創新增長的重要引擎。這些論述之間有着值得細讀的聯繫。基礎設施使地域相接，知識與技藝的往來使人們相識，而對彼此生活的理解，又有助於合作走得更遠。和平與繁榮，需要這樣的相互支撐。

本次會議通過的「深圳展望」，強調分享數位化轉型的收益、彌合數字鴻溝，並支持以人為中心的創新。把這些主張放回日常，便有了可以檢驗的內容：中小企業能否用得起新工具，勞動者能否獲得學習新技能的機會，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人能否更便利地參與交流。人工智能的發展，只有惠及更廣泛的人群，共同繁榮才有堅實的基礎。

對香港而言，這場相聚也帶來貼近自身的思考。詠春、電影與嶺南生活，原本就承載着許多香港人與世界交往的記憶。今天，香港可以把熟悉不同語言、文化和傳播方式的經驗，與灣區的科技創新進一步結合。在一部影像、一場演出或一次面向海外的文化講述中，讓技術幫助人們看得更清楚，讓文化幫助人們理解得更深入。

深圳灣的潮聲，連接着一片更遼闊的海。來自太平洋不同方向的賓客相聚於此，帶來的有市場與技術，也有各自的歷史和生活願望。當年的寫字機械人，把宮廷的天下想像寫在紙上；今天，我們期待人工智能參與書寫的，是更多人能夠共同分享的發展機會。從一隻機械的手想到人與人的攜手，灣區向新的意義，也正在這份面向世界的共同創造之中。



▲深圳APEC配套文化活動中，非遺傳承人與機器人同台展示。 人民網圖片

在不確定中把握確定

如是我見

楊不秋

無意中發現，每天早上我都在差不多的時間出發，可到達辦公室的時間總有些早晚差異。

琢磨一下，好像還有點意思。

起身之後，我會收聽播客，舒展一下身體，再去廚房準備餐食。然後，可能會臨時起意曬被子，也可能啟動掃地機器人做清潔。還要找出合適的衣服，洗漱梳妝，打包餐盒以及檢查門窗水電之類。雖然這些事項隨機繁雜，自帶時間變量，可為了不錯過事先計劃好的出門時間，我也會隨時調整「做」和「不做」，「精做」和「略做」，節奏盡在把握。

家到單位之間的地鐵通勤，照理說沒有太多變量，實則不然。大廈電梯維修，地鐵電梯保養，公司樓下為VIP訪客封鎖專梯，還有在地鐵上時常遇到的「本班列車將會稍為延遲，敬請原諒」，這些三不五時超出掌控的突發事件，實在讓人無所應對。

出門前，因為都能自己把握，很容易就守住出門時間的小目標；出門後，反而存在潛在、未知卻可能隨時突發的不確定，遇到了恐怕也就只能聽之任之而無可作為。

想起一次聚會，朋友問：人生計劃隨時可能會被不可抗力打破，所以人生到底需不需要有計劃？剛剛經歷過幾年的疫情波折，大家都開始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有許多反思。在場多數朋友都紛紛搖頭表示：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，與其花時間制定計劃，還不如見步行步，隨機應變來得務實有用。我很搖擺，一邊覺得這種說法好像很有道理，一邊又心存疑慮：怎麼可以放任自己的人生完全沒有計劃，隨波逐流。

從每天上班這件小事就能看出，生活中確實充滿各種不確定，使得變化無處不在。可正是因為這些不確定和變化，才讓事先的籌謀和計劃顯得更加重要。好比，計劃好出門的時間，後續通勤路上即便遇到小插曲，也不至於遲到。計劃就像一座堤壩，能充分防禦那些可以應對的不確定，讓我們在面對其他不確定時即便束手無策，也能盡量幫補，讓情況也不至於更糟。

最近有天，因為地鐵信號故障，我還真的遲到了。可家住同區的同事好像完全沒受影響。原來，在得知故障後，他立刻決定打車上班了。不得不說，實在是高明。

看來，生活中的不確定是永遠存在的，但是同樣也有很多可以把握的確定。如何把握這些確定，就真的因人而異也有高下之分了。

長卷載百年 筆墨寄初心

——觀李延聲先生畫有感（下）

君子玉言

小杳

人物速寫創作中，其二是《智者》——時代名人速寫系列。這個系列始於一九九五年，延聲老師歷時十餘年陸續積累，為近百位中外各界名人手寫毛筆肖像。他或專程拜訪，或在兩會會場、外事會見、文化雅聚的間隙，抓住每一次當面交流的契機，即興提筆現場寫生。巴金、趙樸初、冰心、啟功、黃胄、貝聿銘、李政道、丁肇中、王淦昌、季羨林、錢偉長、莊世平、伊斯雷爾·愛潑斯坦、基辛格、希拉克、祖賓·梅塔……海內外眾多學者、藝術家、政要，都在他筆下留下剪影。這些人物速寫刪繁就簡、直擊本心，寥寥線條便捕捉人物獨有的氣質風骨，形神具備，鮮活靈動。沈鵬先生讚：「延聲作畫，大處着眼，小處不苟，盡精微而全神韻，致廣大而及毫芒。」關山月老為其畫題道：「以形寫神，貴在『寫』字。寫形是手段，傳神才是目的。」「這正是對李延聲人物肖像最好的概括。」

每完成一幅人物肖像，延聲老師便請畫中人親自題字留跡，有的寫下自己的人生感悟，有的隨心落筆，與延聲老師的畫相得益彰。貝聿銘先生在畫上題：「此畫傳真又傳神」。趙樸老題詞：「毛主席問：『趙樸初。即非趙樸初，是名趙樸初，佛教有這麼一個公式嗎？』我答：『有這麼一個公式。』毛主席問：『怎麼，先肯定，後否定？』我答：『是同時肯定，同時否定。』趙樸初1995.5.7」……延聲老師亦隨畫寫一篇小記，文字清新雅緻。讀畫品文，有趣又發人深思。

我有幸陪延聲老師為星雲大師、江丙坤先生作畫，一次是在星雲大師下榻的金融街威斯汀酒店，另一次是陪江丙坤先生到延聲老師畫室。延聲老師與他們面對面，觀察幾眼後便開始着筆，不用草稿，十幾分鐘後，人物神采氣韻便躍然紙上，觀者無不稱奇。那時星雲大師已目力不濟，由助手扶筆寫下「佛道禪心」，署「星雲·八七」；江丙坤先生則在畫像上留下簽名。我也曾受延聲老師之託，赴港時身背他為金庸先生的寫像，交予好友晴轉送金庸先生。金庸大師在畫上題寫了「情繫河山」四字相贈。

第三類是祥鹿系列。走進人民大會堂，很多人都會在巨作《翠柏意葱蘢 瑞鹿鳴佳音》前駐足留影。寫鹿，延聲老師素有「當代畫鹿第一人」的美譽。他筆下的鹿，眼睛清亮柔和，身形輕巧自在，靈動美好，就像剛從山林裏走出來一般。為畫好梅花鹿，延聲老師特意在北京西郊鳳凰嶺養了幾隻梅花鹿。有空便上山寫生，靜靜看鹿群漫步嬉戲。朝夕相對，鹿的神情動態一點點印在心上，落筆自然傳神。他的《秋叢群鹿》陳列於中南海紫光閣，《翠柏雙鹿圖》曾作為國禮送出。一九九七年，李延聲在紐約辦展，經引薦結識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。他隨後作《鹿娃圖》，題「靈草青青逗鹿還」，託人轉送。安南覆函致謝，讚畫作意境美妙。他以一位中國畫家的身份，表達了一份樸素的和平寄意。基辛格來京出席奧運，翻閱他的畫冊，當面稱讚：「你的作品真讓人喜愛，太精彩美妙了！」

延聲老師曾耗時一年構思繪製《麋鹿百圖》，體現人與自然共生的主題。畫面百餘隻麋鹿，形態各異，一派祥和蓬勃，是他畫鹿題材的一件巨製長卷。

李延聲將所作《顧拜旦畫像》捐贈國際奧委會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為他的奧運主題畫冊《奧運之光》作序，並授予他國際奧委會主席獎，表彰其以中國畫傳播奧林匹克文化。

延聲老師這份筆墨裏的家國底色，來自他獨特的人生來路：祖籍中山，生於延安。中山是「振興中華」理想萌發之地，延安則接續着這份求索的初心。父輩的追求、延安的歲月，自年少便浸潤着他。兒時以樹枝在地上塗畫的片段，是他筆墨生涯的開端，這份對家國、對時代的牽掛，從此一直伴他落筆。

如今八十三歲的他，依舊日日伏案、筆耕不輟。世人只看見恢弘巨作、滿堂風華，卻不知創作背後的艱辛。為完成大幅歷史畫作、殿堂巨製，他常常登梯爬高、仰首揮毫，也時常跪伏在地、俯身細琢，一寸一寸打磨畫面細節，數十年持之以恆，這份執著與勤懇，令人由衷敬佩。

他以師從關山月、潘天壽、蔣兆和、葉淺予、李可染、黃胄、李苦禪等大家薰陶下習得的深厚功力，懷着真摯的初心，畫我們的家國，畫我們的時代，畫中華民族走過的路，把值得珍重的歷史和人物，把世間美好的感懷祈願，一一凝於筆底。

一卷長卷，數十年沉心鑄就；一支毛筆，一輩子向時代致意。筆墨無聲，情懷自遠。讓我借用馮驥才先生的話，來表達對延聲先生的敬意：「在當下這個充滿物慾的時代裏，有多少藝術家還會心懷如此真誠又執著的藝術精神？」



▲李延聲創作的祥鹿圖。 作者供圖

西方「奇葩」

客居人語

姚船

趁着午後陽光和暖，我們在街區人行道散步。

忽然，有人猛地擦身而過，把我嚇了一跳。原來是一個騎單車男孩。他聽見有個女聲喊他：「慢一點！」隨即身子略一傾斜，右腳踮地，停在十幾米遠的地方。這時，一位年輕女人從後面匆匆趕上，在我面前露出一個歉意的笑容，說：「馬路車多，危險。」然後，快步向前。

按市府交通規例，人行道是不能踩單車的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怕小孩子騎單車在馬路不幸和汽車相撞，所以不得已走到上面。

記得以前在內地時，我每天都是騎單車出門，自認技巧「過硬」。到多倫多後，也曾買一架單車，走街串巷，探索城市風光。但有次差點被汽車撞到，從此心有餘悸，再沒騎過。

多倫多與北美其他大城市一樣，馬路汽車如龍，加上有駕駛者超速開車，交通事故頻頻發生。近年，提倡綠色出行，油價又飆升，不少人改用單車代步，令馬路顯得更加擁塞，汽車與單車碰撞導致傷亡事故不絕於耳。

為緩和這種情況，加強道路安全，市政府逐步在馬路設單車專用線，尤其在繁忙地段，避免汽車與單車爭道。

實踐證明，自有了單車徑，騎車者被撞事故有效降低，措施深受單車愛好者歡迎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省府現在卻以「阻塞交通」為由，下令拆除一些路段的單車徑。雖然遭到市政府、專家學者及單車倡權組織的強烈反對，但省府依然在示威抗議聲中強行動手。

市府有關部門估算，按省府指定要拆除的多處地段，從移除路緣石、分隔柱、標誌、巴士站台和有關單車徑設施，到路面修補、重鋪、新劃線，以至更新設施，需花費超過一千萬加幣。市府指此舉「離譜」，民眾則批「荒謬」。撇開安全不說，在目前房租、物價飆升，令更多人需到食物賙濟庫尋求幫助的情況下，該筆資金可給多少人填飽肚子！

其實，執政者「離譜」、「荒謬」的「奇葩」行為屢見不鮮。再以城市交通為例，汽車超速駕駛可說是「老大難」問題，為遏制「馬路驚魂」，多倫多有關部門在一些交通黑點安裝測速攝影機，並在路邊明確標示，提醒司機小心駕駛。

多倫多西面有一段馬路，堪稱超速之最，規定五十公里限速，有的車卻以超過一百公里時速狂奔。自安裝測速攝影機以後，該地段首年錄得超過一萬張超速告票，有司機一天之內四次犯規。據媒體披露，甚至有省府內閣官員也曾在此道收到「牛肉乾」（告票）。雖然該相機多次被人為破壞，但交通事故卻大降四成。住在該地區居民都認為測速相機起到一定阻嚇作用。然而，省府卻突然勒令，要拆除市內所有偵查超速車輛相機，認為這只是「斂財工具」。此舉不單遭到多倫多上下一致反對，連警方也不認同，但權力壓倒一切。而在相機拆除後，該地段及市內因超速引發的交通事故又明顯上升。

不少人認為，在關稅戰陰影下，生活成本不斷加劇，醫療、教育、住房等問題日益惡化，省府不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重大事務上，反而着力於把某個城市、某條街道的單車徑或測速攝影機拆除，豈不是本末倒置？

西方社會，民眾的意願，往往敵不過權力的任所欲為。